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王伯沆批校 《红楼梦》

[一]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王伯沆批校 《红楼梦》

[一]

苗怀明 整理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 序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历史上各朝唯一的国家高等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皆可称为“辟雍”，而明代曾于北京和南京各设一所国子监，号称“北雍”和“南雍”。因此，作为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新式学堂，三江师范在当时也就承膺了“南雍”的美誉。1914 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的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

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孕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萃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王伯沆和他的《红楼梦》批校

苗怀明

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精读《红楼梦》20 遍，批校 6 次，留下 1 万 2 千多条、近 30 万字的批语。尽管自《红楼梦》面世以来，进行品评、鉴赏者甚多，产生较大影响者也不乏其人，但如此投入，如此下工夫，成果如此卓著者，则极为少见。这不能不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现代著名学人王伯沆。

—

与同一时期的很多风流人物相比，王伯沆的人生似乎有些平淡，其平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图书馆中度过，不外教书、做学问，属于那种较为纯粹的学人，缺少人们所期待的传奇和浪漫色彩。自然，这并不见得就是人生的缺憾。唯其如此，才显得可贵。毕竟作为学人来说，耐得住寂寞，安贫乐道方为本色，正是因为不少人做不到，所以才成为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不可能每个学人都像胡适那样，游刃于学界、政界之间，三教九流通吃。人各有志，不能按照一种固定的人生模式来要求所有的学人。

尽管在《红楼梦》的批校上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就王伯沆的整个治学生涯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而已，其平生事业和成就并不限于此。他在多个领域都有不俗的建树，这也是这一时期很多学人的一个共性。

道德文章,这是人们对学者为人为文的期许。就王伯沆平生的为人行事而言,他是当得起这四个字的。平日埋首书斋,钻故纸堆,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到了家国沦陷、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则是非分明,绝不含糊。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否则就是书呆子、糊涂虫了。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心国事,抨击时政,曾写信和朋友说:“疾风劲草,上亦须有气骨,方是出处一贯之学,不当专指有位者言也。”^①抗战期间,王伯沆因病滞留南京。南京沦陷后,他拒绝与日伪合作,宁愿出让旧日藏书谋生,也不愿在日伪政府及其所把持的学校中任职。一家人依靠故友门生们的襄助,勉强维持生计。面对强敌的引诱和胁迫,他深明大义,坚守民族气节,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王伯沆去世后,国民政府给予“明令褒扬”,称其“坚贞守道,嶙然不污”^②。应该说这个评价是相当客观、公允的。此外,王伯沆在生活上严于律己,也是可以成为世人楷模的。

王伯沆除在书局、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短期供职之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育人,他早年曾受聘陈三立家塾,担任陈寅恪的启蒙教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供职长达30年,经历了这所高等学府从初创到辉煌的发展和变迁。他所承担的课程主要有“论孟举要”、“书经举要”、“练习作文”等。在此方面,他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循循善诱,指导有方,桃李天下不说,门下还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弟子,如常任侠、唐圭璋、卢前、潘重规、周法高等。即使没有著书立说,仅仅是在教书育人这一领域,王伯沆也是可以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

就治学而言,王伯沆的成就是学界及社会公认的,或称其“一生治学,造诣精深”^③,或称其“学问淹博,志节高尚,素为乡邦矜式,后学楷模”^④。

① 转引自周本淳《王伯沆先生传略》,《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3、4期合刊。

②③ 《国民政府令》1945年8月18日处字106号,载《南京文献》第21号,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1948年9月刊行。

④ 《通志馆致市政府公函》青字第26号公函,载《南京文献》第21号,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1948年9月刊行。

他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除其本人天赋较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比如家庭的熏陶、个人的努力、名师的指点等。在求学过程中,他曾先后得到过高子安、端木埭、黄云鹄、黄葆年等名家的指点,所学习的知识也是涉及多个领域:书法、赋诗、《说文解字》、佛学、太谷之学,等等,用一位学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博通经史小学各体诗文,下逮说部,靡不精究”^①。这种学习背景和知识结构也潜在地影响了其治学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不固守一隅,涉猎广泛。从其个人藏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统计,王氏生前藏书约有1300余种,8100余册^②,这一数量与那些以藏书见长的学人如郑振铎、马廉等人自然是无法相比,但也称得上较为丰富了。这些藏书就其内容而言,涵盖四部,涉及面很广,其中不少还有王氏本人的批点,由此可见其治学兴趣之广。

王伯沆虽然治学博通、勤勉,但平生撰写的学术专著数量并不多,仅有《四书私记》、《经略台湾事纂》、《王氏族谱》等数种,且大多不愿公开刊行。他更多地继承了古人述而不作的治学风范,以批校古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这种著述方式虽然缺乏现代学术的那种系统性和严密性,但其中真知灼见,时时闪现,颇显学术功力,自有其价值和特点。这种批校与其个人丰富的藏书结合起来,数量多达一百三十多部,经史子集,皆有涉猎,其中有不少为善本、珍本。这种渊博和勤奋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对王伯沆的治学历程,其弟子曾进行过如下概括:“先生之学凡三变:弱冠肆力古文辞,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四十以后出入于佛老。”^③在所涉猎的各领域中,王伯沆对经学用力最多,成就也最著。他对四书有着精深的研究,不仅开课讲授,言传身教,而且多次进行批点,由此获得了“王四书”

① 王焕镛《本师冬饮先生行述》,《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3、4期合刊。

② 此数字据张敏文《〈王伯沆先生借存书目〉概述》(上)一文而来,《文教资料》1994年第4期。

③ 钱堃新《冬饮先生行述》,载《南京文献》第21号,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1948年9月刊行。

的美名。对宋明理学,他也有着更多的认同,“专力宋明诸儒之书,参以玄净家言,躬行实践,尽扫门户之见”^①。

此外,其书法、其绘画、其篆刻、其诗文,等等,也都是大有可说之处的,比如柳翼谋曾称其诗作“镂空抉幽,得少陵之骨二变焉者”^②。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不再赘述。

王伯沆主要生活在晚清和民国,经历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是现代学术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无论是就行事为人,还是就学术研究而言,在其身上都体现出新旧交替那种杂糅的过渡性特点。他对旧的治学方式有着更多的认同,从其治学兴趣到著述方式,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与此同时,他又任职于现代高等学府,接受并适应了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制度,在其身上又体现出新的一面。

认识王伯沆的学术成就和地位需要一个过程,就其在公众及学界的知名度而言,自然无法与同时期的胡适、陈寅恪、陈垣等著名学人相比,因而身后显得有些寂寞,相关的探讨也要少得多。不过,一位学人的知名度与治学成就并不总是成正比,在王伯沆身上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东西。好在其诗文集《王冬饮先生遗稿》早已刊印,其《红楼梦》批语也被整理刊布,广陵书社近年正以《冬饮丛书》为名陆续将其批校的古籍影印出版^③。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和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这位有成就、有特色的学人了。

二

就其动机而言,王伯沆批校《红楼梦》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具体说来,就是一种对小说的偏好。也有研究者指出,王伯沆的思想和治学受太谷学派影响甚大,而这一学派“与儒家传统的立身原则则不尽相

①② 王焕镛《本师冬饮先生行述》,《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3、4期合刊。

③ 该丛书具体情况参见王伯沆先生圈点手批本《红楼梦》出版前言及书后“冬饮丛书书目”,广陵书社2003年版。

同,除重视经典文化外,还不废文学创作,尤其是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功能”,“把小说创作和研究作为‘立言’的方式之一”^①。结合王氏的生平及治学来看,这一说法对解释王氏批校《红楼梦》的动机还是颇有启发性的。

王氏平生治学重点及成就固然在经学,但他对小说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从其个人藏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其较为丰富的藏书中,经史类书籍占有较大的比重,不过其子部书籍特别是小说作品也有不少,如光绪间石印本《儒林外史》、道光间双清仙馆本《红楼梦》、有正书局石印本《原本红楼梦》、中华书局排印本《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真谛》、《红楼梦评赞》、石印本《儿女英雄传》、《绘图增批西游记》、《纲鉴通俗演义》、《武帝内传》、《情史类略》、同文书局石印本《聊斋志异》、《夜谭随录》、《子不语》、《小豆棚》、《燕山外史》,等等,其中以有关《红楼梦》者最多^②。他曾说自己“极喜看此书,二十次矣”^③。由此可见王氏对《红楼梦》的喜爱程度。

在阅读品赏之余,王伯沆还对自己比较喜爱的一些小说作品进行批点。《红楼梦》之外,他还为《儒林外史》作了批点。其《儒林外史》批点以增补齐省堂本为底本,共有 728 条批语,全为眉批,多使用朱笔,时间“可能也作于 1914 年的前后”,其中“有不少独得会心之处”^④。遗憾的是,这些批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不少人甚至都不知道此事。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王伯沆对小说的浓厚兴趣,他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批校《红楼梦》并非偶然。在批校《红楼梦》时,王氏还不时提及《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小

① 万晴川《太谷学派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7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张敏文《〈王伯沆先生借存书目〉概述》(上、下),《文教资料》1994 年第 4、5 期。

③ 王伯沆《冬饮庐藏书题记》之《红楼梦索隐》,载《南京文献》第 21 号,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 1948 年 9 月刊行。

④ 以上见王伯沆《儒林外史》批语,《文教资料》1985 年第 5 期。本文对王伯沆《儒林外史》批点的介绍主要参考该文。

说,其中的人物、情节、文句随手拈来,由此可见他对这些作品的熟悉程度。

王伯沆起意批校《红楼梦》时,距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已有好几年的时间,这种新的文学观念要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还需要一段时间。对小说的批校尽管已有不少人做过,但仍被视作壮夫不为的小道。由此可见王伯沆思想的开明、通达之处。从王伯沆好友及弟子对其《红楼梦》批校刊行的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从20世纪40年代起,王氏的好友及弟子围绕其《红楼梦》批校是否要公开刊行曾产生过争论。反对者担心其《红楼梦》批校无法体现王氏学术的博大精深,担心“一代通儒被误解为批小说的”^①,结果王氏的《红楼梦》批校刊行之事被长期拖延下来。而此时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早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受到学界关注。那些反对者们肯定不会想到,日后人们了解王伯沆更多的是通过其批校本《红楼梦》,而不是其他著作,由此也可见出王氏的先见之明。

具体说来,王伯沆如此喜爱《红楼梦》主要有如下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因素是他为《红楼梦》高超的文学水准所折服,为其奇妙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对王伯沆来说,批校《红楼梦》虽然费时费力,但他并不感到辛苦,从中得到的更多的是乐趣。在王氏的《红楼梦》批语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评价:“字字欲活”、“精妙已极”、“文极曲折顿挫之妙”、“真才人之笔”、“笔情灵妙至此”、“绝世奇文”、“真有精细玲珑之妙”、“文心细极”。这些都是极高的评价,他丝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语,可见王氏对《红楼梦》的喜爱是发自肺腑的。

另一个因素则是因为《红楼梦》所表达的一些思想为他所认同,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比如作品中所流露的一些现实批判思想,王伯沆有着切身的感受,他认为这部小说“于世情种种状态,无所不包”(第七回眉批),经常将《红楼梦》中一些有关世态人情的描写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良风气对照来看,以此抒发对不良社会风气的不满。比如在第二回,他针

① 王伯沆先生圈点手批本《红楼梦》出版前言,广陵书社2003年版。

对“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等语批道：“近日入都夤缘门路，多由京店穿插过付者，皆子兴一辈人也。”借批点《红楼梦》，对当时接援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批评。再比如第十六回，赵嬷嬷一句“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引起了他的很多感慨：“彼时中外既未通商，所有银子不在国库，即在民间，化来化去，并无大损。若今日，利权既已外溢，要人赃款，动辄若干万万，都汇存欧美，人民安得不穷？求以中国银子化在中国，都不可得矣。阅至此，不觉且叹且羨耳。”对当时政局的不满和忧虑，跃然纸上。

《红楼梦》所流露的佛教思想，也深为王氏所赞同，并加以发挥。比如对作品第六十六回的回目“冷二郎心冷入空门”，王氏作了这样的阐述：“以世谛言，心冷入空门；以佛谛言，惟大热心人方有作用，否则焦芽败种自了汉耳。”（六十六回眉批）

1911年3月，王伯沆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部清双清仙馆刊本《红楼梦》，但该书“各卷俱有残缺”，其中第一册缺少卷首部分，其他各册也有不少缺页。到1914年秋，其另一位好友汪振之“为觅得石印《石头记》首册”，帮他补配到第1册所缺部分，“因摘要存之”，他本人又“手抄缺页，订成完书”^①。正就是从这一年的夏天，王伯沆开始对这部《红楼梦》进行批校。在此后的25年间，他总共批校过6次，每次都使用不同的墨色，分别是朱、黄、绿、墨、紫，其中墨笔使用了两次。

其使用不同墨色批校的时间、数量等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②：

墨 色	时 间	批语数量
朱	1914年夏6月	1358条
黄	1917年秋初—1918年6月	3208条

① 王伯沆《冬饮庐藏书题记》之《红楼梦》冬饮五色手批本批语，载《南京文献》第21号，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1948年9月刊行。

② 这是笔者依据电脑所做的统计，与赵国璋、谈凤梁《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一书前言里的统计数量12387条稍有出入。

(续表)

墨 色	时 间	批语数量
绿	1921 年春—1922 年冬初	2 227 条
墨	1927 年 6 月完成、1932 年除夕前两日完成	5 145 条
紫	1938 年 11 月 15 日完成	394 条

以上共 12 332 条批语,再加上那些后来被整条删去的批语 94 条,总计 12 426 条。还有 124 条批语王氏作了较大的字句改动,这里不重复统计在内。

之所以要将那些后来被删去的批语也一并统计在内,是因为这些批语反映了王伯沆当时的思想和认识,而且这些批语如今大多可以辨识,也是研究王伯沆《红楼梦》批校的重要资料。通过批点时间的先后次序及相关删改的痕迹,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王伯沆批校《红楼梦》的情况及其思想认识前后的一些有趣的变化。比如作品第十三回,贾宝玉听到秦可卿死去的消息,“不觉‘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在这句话后,王氏起初用朱笔批道:“此血不吐于贾蓉而吐于宝玉,大奇。”后来他觉得此批对贾宝玉的行为有误解,就用黄笔批道:“前批未是。”再后来,又用墨笔将这两条批语都给删去。其思想前后变化之迹,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再比如作品第六十七回,兴儿见贾琏偷娶的事情被王熙凤发现,吓得“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王伯沆起初认为“砖地”二字不够合理:“此是内室里间门旁,不应还是砖地。以其声考之,当以‘地板’二字为妥。”后来他在北京见到实物,改变了这一看法:“前批误了。余入都后,方知自宫禁至民居,内室皆系砖地,不似江南用地板也。”(以上六十七回眉批)为此他删去了前一条批语。如果不保留前一条批语的话,对王伯沆这一认识的改变就不容易了解了。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王伯沆批校《红楼梦》所使用底本的情况:

王伯沆批校《红楼梦》所用底本的主体部分为清双清仙馆本,共 120 回,120 卷,分装 24 册。正文半叶 10 行,行 22 字。每卷卷首题“红楼梦

卷×”、“洞庭王希廉雪香评”，卷后有评，卷末题“红楼梦卷×终”。版心题“红楼梦”、“第×回”。其行款版式与一粟《红楼梦书录》一书所著录的清双清仙馆初刻本相同^①。这个版本刊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书名为《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该本是程本系统的一个早期刊本，系据程甲本而来，但文字不尽相同。在批校过程中，王伯沆称这个本子为“改本”，因其曾经过高鹗的修改。

王伯沆所用底本的第一册卷首部分缺失，所缺内容依次为：王希廉批序、程伟元原序、绣像 64 幅、目录、读花主人《红楼梦论赞》、红楼梦问答、大观园图说、周绮《红楼梦题词》、王希廉《红楼梦总评》、音释。

有意思的是，王伯沆在补配时并没有使用原书，而是选用《增评补图石头记》本的卷首。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这一版本在当时十分流行，比较好找。二是该本卷首的内容特别丰富。其中第二个原因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后来王氏找到原本，补全了正文，但并没有因此更换卷首。

这个《增评补图石头记》本卷首的内容包括回目、护花主人批序、读法、护花主人总评、护花主人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或问、读花人论赞。总目中所列的原序、题词、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大观园图说、音释等内容则未见。这些内容基本将双清仙馆本卷首的内容涵盖进去，并且更为丰富，难怪王氏加以采用。

该书为铅印本，正文半叶 14 行，每行 31 字，总目后有日文校字者的署名。从内容及版式来看，该书与清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相同^②，赵国璋、谈凤梁在《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一书前言中说该书为“一九〇五年日本排印的、王希廉和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按：目录后有日文的校字者署名）”，不知何据。1905 年日本排印本为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刊印，系据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翻印^③。如果只是因为目录后有

① 参见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46 页。

② 参见一粟《红楼梦书录》第 56—58 页相关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③ 参见胡文彬《红楼梦叙录》第 47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魏绍昌《〈红楼梦〉版本简表》，载其《红楼梦版本小考》第 60—6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日文校字者署名的话,证据则嫌不足,因为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也有完全相同的日文校字者的署名。

其他各册所缺文字,王氏则采用清双清仙馆本进行补抄。据笔者统计,各册共缺失 35 页^❶,现将缺页分布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卷、回	缺失数量(页)	卷、回	缺失数量(页)	卷、回	缺失数量(页)
1	5	56	1	103	1
6	1	65	1	106	1
12	2	69	3	111	3
20	1	74	1	112	1
44	1	75	1	117	1
50	1	90	2	120	3
51	2	100	1		
55	1	101	1		

缺失的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抄补起来也是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样,经过拼配和补抄,王伯沆拥有了一部完整的《红楼梦》,他的批校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的《红楼梦》批校之外,王伯沆还在有正书局本《原本红楼梦》和中华书局本《红楼梦索隐》上进行了批点,两书已被列入待出的《冬饮丛书》,不日即可公开刊布。

三

大体说来,王伯沆对《红楼梦》一书的批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点,一是校勘。

王伯沆的批点主要是针对《红楼梦》作品正文及王希廉、姚燮等其他批点者的批评和圈点。就批评的形式而言,其中绝大部分为眉批,只有一

❶ 赵国璋、谈凤梁在《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一书前言里的统计数字为 33 页。

小部分为底批、侧批和回后批。

就内容而言,这些批评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针对作品进行的评述,包括对《红楼梦》的思想、人物、情节、技法、语言等问题发表个人的见解。对这部分内容,后文将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此不赘述。

另一部分则为注释,对作品中所提及的掌故、物品、诗词、历史人物、风俗等词语进行解释。其中有不少解释,王氏旁征博引,使用大量文献加以印证,由此可见批点者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比如第三回“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一语上,王氏对“轿”的来历进行溯源:“‘轿’不始于清。《史记·河渠书》:‘禹,山行即桥’,即轿也。《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逾岭’,已用‘轿’字,但皆平声。自宋以后至今,遂通用去声耳。近人谓乘轿为逊清陋习,不觉一笑。因略识之。”引用《史记》、《汉书》等典籍加以说明,对读者来说,由此也长了不少见识。比如作品第五十五回,王氏对清代嫡庶分别之森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这对理解探春的处境,贾宝玉与贾环的矛盾是很有帮助的。其他如“髻”、“刻丝”、“汝窑”、“行当”、“茅厕”、“如意”、“把柄”、“牙子”、“雕漆”、“家生”、“螺甸”、“猫儿眼”、“杌子盖”、“坐床撒帐”、“盖头”等等,也大多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解释的。自然,也有不少词语一时不知出处,难以解释,如“爬灰”、“膈肢”等,则存疑,以示慎重。

更为难得的是,王氏不时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对一些词语、掌故或风俗加以说明,或指出其中的不妥之处,给读者以更亲切、更直观的感受。比如对“辣子”这个词语,王氏是这样解释的:“今南京犹有此称,言无赖也。余按《五代史·汉高祖纪》有‘此都军甚操刺’之语,注云:‘俗谓勇猛为操刺。’是‘刺’讹‘辣’也。”(第三回墨笔底批)一方面征引《五代史》对词源进行考索,一方面又根据个人的阅历进行印证。王氏出生在南京,又长期在南京生活、工作,对南京本地的语言自然十分熟悉,因此他的这一解释是可信的。再比如作品第二十三回,贾芹领到白银后,“随手拈了一块与掌平的人”,王氏就此批道:“清时用银,除五十两用元宝,零数即用碎

银。自光绪初年,或用银票,或用番洋,市上碎银渐少矣。再二十年,定无人知有此事。附志于此。”可见作为亲历者的王氏是有意保存这些材料的。如今已有好几个“二十年”过去了,读者对清代使用碎银的情况更不了解,有了王氏的解释,就容易理解多了。其他对“褂子”、“斗篷”、“战靴”、“一丈青”、“送粥米”、“睡鞋”、“护身佛”等词语的解释也多是如此。

由于6次批校的时间有先后,王伯沆共使用了朱、黄、绿、墨、紫5种墨色进行区别。其圈点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作品中较为精彩的段落或文句;一是批校者认为值得注意、需要对读者进行提示的地方;一是进行批评之处。其中有不少文句被批校者用不同墨色先后圈点过多次,可见他对这些地方是特别欣赏或关注的。可惜由于印刷较为困难,这部分内容只能暂付阙如了。

在批点的同时,王伯沆还对《红楼梦》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认真的校勘。其校勘主要以清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为底本,采用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出版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为校本。这个校本的底本为戚蓼生序本,俗称“戚序本”,这是第一个被公开刊行的脂本系统的版本。上海有正书局先后刊印过两次:第一次是1911—1912年,共20册;第二次是1920年,共12册。其中1920年第二次的石印本系用第一次刊本剪贴之后照相缩印的,因其字号变小,人们习惯上称第一次刊本为大字本,称第二次刊本为小字本。小字本1927年曾再版。

那么王伯沆用作校本的是哪一种版本呢?赵国璋、谈凤梁认为是有正书局小字本1927年的再版本:“在王氏那个时代,脂批本出世的还不多。他看到的主要是一九二七年有正书局的小字本,在批语中称之为‘原本’。凭借这个原本,王氏对王希廉本进行了校勘。”^①但没有说明这一判断的依据。据笔者的考察,这一判断还是有道理的。首先,从墨色来看。王氏所写的校勘记录主要使用墨笔,少量使用紫笔,未见用其他墨色。前文已经说过,王氏使用墨笔批点有两次:一次是1927年6月完成,一次是

① 赵国璋、谈凤梁《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932年除夕前两日完成。使用紫笔的时间则更晚。因此,从使用的墨色来看,王氏进行校勘的时间最早是在1922年初冬之后,1927年6月之前。此前,大字本、小字本皆已刊行,王氏为何不据以进行校勘呢?很可能他手头没有,到1927年,买到小字本的再版本后,才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其次,从王氏的藏书来看,他藏有一部有正书局的石印本,12册,而且还进行过批点^❶。这显然是小字本。因此,说王伯沆使用的校本为小字本1927年的再版本,是有道理的。

有趣的是,王伯沆当初曾见过小字本的底本。在卷首《读法》的批语中,他说到了这件事:“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非原稿影印”指的是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在上面加了不少自己及其他人的批语。从王氏和俞恪士谈论有正书局本的情况来看,他当也见过大字本,因为俞恪士的卒年为1918年,他们谈论的时间当在1918年之前,此时小字本还未刊行。但当王氏使用朱、黄、绿笔批点《红楼梦》时,均未谈及“原本”问题。这说明他当时只是“互读之”,还未进行校勘工作。

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927年的5月,胡适意外地得到了甲戌本。1928年2月,他撰文披露了这一重大发现,从而使《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甲戌本的发现使人们对《红楼梦》版本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观,知道在程本之外还有一个脂本系统。有了这样的认识,反观上海有正书局刊行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才意识到其底本戚序本是一个早期的抄本,也是属于脂本系统。

王伯沆所作校勘记录主要使用墨笔,他使用墨笔共批校过两次:一次是1927年6月完成,一次是1932年除夕前两日完成。这样,他校勘《红楼梦》可能是从1922年年底到1927年6月之间,也可能是从1927年6月到1932年除夕前两日之间,也可能前后两次都进行了校勘。此外,王伯

❶ 参见张敏文《〈王伯沆先生借存书目〉概述》(上),《文教资料》1994年第4期。